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吗

孙楚仁, 李媚媚, 陈瑾

摘要: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以及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利用生存分析模型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 (1)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出口风险, 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2) 进一步分析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进而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3) 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因产品类型、企业所有权、企业贸易方式、是否为“一带一路”共建国以及目的国政治风险高低而异。研究论证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的经济合理性, 评估了其对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的实际影响, 能够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实证参考。

关键词: 双边政治关系;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生存分析; 贸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 F74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94 (2022) 07-0004-21

DOI:10.13687/j.cnki.gjjmts.2022.07.001

一、引言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盛行, 霸权主义国家致力于遏制他国崛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家利益冲突和分配争夺激烈, 国际格局发生根本变化。过去,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一般只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全球化时代使得国家间经济实力较量加深, 各国趋于将经济意图贯穿到外交活动和政治交流中 (张建红、姜建刚, 2012), 政治关系逐渐服务于国家总体经济利益, 成为一国寻求效用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同时, 双边政治关系不仅仅只作用于政治层面, 还会影响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 传统贸易理论通常认为, 只要两国间存在要素禀赋和生产率差异, 两国的贸易联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实际上, 国家间贸易出现多次中断甚至中止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①。由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和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 因此国家之间的贸易中断或中止很难用现有

收稿日期: 2021-10-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8ZDA039);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青年项目 (2021A151511031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1YJC790010);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面上项目 (2021A1515011452)

作者简介: 孙楚仁 (1976-), 湖南郴州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地缘政治与经济; 李媚媚 (1997-), 女, 广东肇庆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陈瑾 (1991-), 女, 江苏盐城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财政与贸易。

的贸易理论来解释。在全球贸易由经济逻辑转向政治逻辑的今天, 重视双边政治关系对国家间贸易联系持续性的影响, 显得十分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基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以及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匹配数据, 利用生存分析法 Cloglog 离散时间模型, 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并考察了其作用渠道为双边贸易成本。这些结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决定因素、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的认识。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贸易动态影响的认识。目前已有文献考察了产品差异、市场潜能、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等因素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杜运苏、杨玲, 2013; Fugazza & McLaren, 2014), 也已有文献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出口可能性和出口额的影响, 但尚未有文献就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进行研究。第二, 本文从企业层面丰富了双边政治关系对贸易影响的认识。现有研究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文献多基于产品层面或企业 - 产品层面 (邓路, 2018; 罗胜强、鲍晓华, 2018), 本文基于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层面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研究层次更细致, 更有助于分析双边政治关系对不同所有权类型、出口不同类型产品的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文章剩余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是理论机制与假说; 第四部分是数据处理和统计描述; 第五部分是计量模型; 第六部分是实证结果, 包括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 第七部分是机制分析; 第八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

第一类文献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出口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首先, 许多学者在国家层面、使用不同的双边政治关系测度方法研究发现,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双边贸易量的增长。Mitchener & Weidenmier (2008) 以是否同属于同一帝国衡量双边政治关系; 王珏等 (2019) 采用联合国投票数据; 杨攻研、刘洪钟 (2015) 采用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 都印证了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提高双边贸易量的增长。

其次, 学者们还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带来的其他出口贸易效应。谢建国 (2006) 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将有助于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指控的下降。孙俊成、程凯 (2020) 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有效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刘敏等 (2020) 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

再次, 部分学者考察了政治因素影响贸易的作用渠道。一是,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影响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影响贸易。Athanassiou & Kollias (2002) 认为紧张的贸易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影响企业签订贸易合同, 进而导致贸易量的下

降; Keohane (2005) 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的不确定性, 进而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Long & Leeds (2006) 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会通过降低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 降低企业贸易的投机行为。二是,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影响贸易成本进而影响贸易。Pollins (1989) 认为双边政治关系恶化会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 并将政治关系视为冰山成本的一部分; Keohane (2005) 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从而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Böhmelt (2010) 研究发现在企业的贸易中, 寻找新的贸易市场带来的损失远高于维持原有贸易市场的成本, 若发生政治冲突可能会导致企业去寻找新的市场而产生更大的贸易成本, 进而影响企业的贸易。三是,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影响人们对一国商品的消费心理或者情绪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Disdier & Mayer (2007) 研究发现具有亲和力的国家有改变消费者偏好的潜能, 进而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来创造双边贸易流量; Pandya & Venkatesan (2016) 基于美国的超市样本, 分析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美法僵局关系对美国消费者关于法国商品消费行为的变化, 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由于仇视心理情绪而抵制法国商品, 大大减少了对法国商品的购买。

第二类文献考察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Besedeš & Prusa (2006) 开创性地利用美国进口贸易数据, 基于连续时间的 Cox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口持续时间非常短暂, 且研究得出了初始额与产品的差异化对贸易持续时间有着显著影响的结论。后续研究进一步考察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 Hess & Persson (2011)、Esteve-Pérez et al. (2013)、Fugazza & Molina (2016), 国内学者邵军 (2011); 陈勇兵、李燕 (2012); 杜运苏、杨玲 (2013); 逮宇铎等 (2015); 刘洪铎、陈晓珊 (2018); 马佳羽、韩兆洲 (2018); 魏昀妍、程文先 (2021) 等基于产品或企业层面的进出口贸易数据, 综合考察了产品特征、企业特征以及国家特征等因素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

许多学者基于国家层面特征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一是产品层面的研究。邓路 (2018) 实证检验了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形象评价对中国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有促进作用。李星辰、刘宏曼 (2020) 研究发现双边关系改善对中国出口贸易关系平稳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二是企业-产品层面的研究。罗胜强、鲍晓华 (2018) 实证检验了反倾销会导致企业退出市场危险率增加。三是企业-目的国层面的研究。谭智等 (2014) 发现目的国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企业出口生存。四是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研究。Esteve-Pérez et al. (2013) 发现目的国异质性——国家(政治)风险、合作伙伴 GDP、邻近性、信息溢出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有限制作用。魏自儒、李子奈 (2013) 发现先锋企业在早期的生存持续时间较长。杨连星等 (2016) 研究发现文化产品出口品质有助于稳定文化贸易联系持续时间, 而出口价格抑制了贸易联系持续期。沈立君、侯文涛 (2017) 发现反倾销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刘慧、綦建红 (2017) 实证检验了“邻居”可以通过信息溢出降低企业对新出口的不确定性, 改善其出口生存状态。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 许多学者已经从国家、企业或产品层面就双边政治关系对出口贸易量的影响进行考察, 也有极少文献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但很少学者从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将双边政治关系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 本文以国家间双边政治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以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 运用生存分析方法, 针对双边政治关系是否对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产生影响进行分析。

三、理论机制与假说

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社会各国之间政治力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竞争、合作、冲突等结构态势, 必然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 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会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 如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等。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有效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降低企业外部经营风险 (Long & Leeds, 2006), 从而降低企业为应对贸易和经营风险而支付的保险费用, 进而提升企业投资行为的可能性。第二, 由于国内外企业与投资者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信息的传导时效性越来越高, 导致信息“轰炸”无时无刻不在, 而经济活动参与者越来越多并且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导致交易双方为获取对方信息需要付出更多的交易费用。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提高经济代理商之间的透明度, 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投资企业获取经营许可, 以尽快适应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 (王智新、黄瑞玲, 2020)。第三,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 伴随着越来越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因此中国逐渐倾向于利用自身国际政治影响力以进行经济外交。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使东道国加强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信任, 使东道国消费者对“国家认同”的力量转化为对中国企业的认可, 从而降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营销成本, 创造和激发东道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需求, 进而创造双边贸易流量 (Disdier & Mayer, 2007; Pandya & Venkatesan, 2016)。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延长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

上述机制都可以从双边政治关系降低双边贸易成本这一机制来进行总结。双边政治关系降低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贸易的风险, 可以降低企业为进行贸易而支付的保险费, 而这最终可被纳入到双边贸易成本之中。双边政治关系降低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贸易的信息不确定性, 可直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增进东道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及其出口产品的信任, 亦可降低中国企业的营销成本。事实上, 双边政治关系是国与国间存在的实质性的安排, 同时也是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体现 (Jönsson, 2002)。贸易成本理论将贸易成本定义为商品在销售过程中发

生的所有成本(生产成本除外),其中包括关税、政策壁垒、运输成本、合同执行成本等(Anderson & Van Wincoop, 2004)。一方面,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两国企业进行商品贸易的壁垒就会提高(Martin et al., 2008),原因在于当双边政治关系恶化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运输、市场运转造成阻碍,使得交易的成本或合同的风险提高,从而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产生负向作用。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提高双方的信任度,能够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包括运输路线缩短与运输保险费降低带来的运输成本的下降、关税与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削减带来的企业成本的下降、政策法规透明化带来的风险降低以及双边了解程度加深带来的合同执行成本的下降等,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另一方面,当双方国发生政治冲突时,双边将彼此采取更为严格的贸易管制、高税收、严苛的市场准入条件等政策壁垒来限制对方国家的企业在本国的经营,从而增加了双边贸易发展的显性壁垒与隐性壁垒,造成信息交流缓慢,进而导致对方国家的出口企业面临更大出口风险(Keshk et al., 2004)。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提高双方政治互信度、促进彼此之间达成共识(Li & Vashchilko, 2010),政治互信能够帮助一国企业以国家力量为背书,从国家制度层面解决严格的贸易管制、高税收、严苛的市场准入条件等问题。同时,理性选择主义也认为,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国家间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合法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为企业的国际经营提供保护力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延长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

四、数据处理与描述统计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主要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亚太经社会-世界银行贸易成本数据库等。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本文可以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为此,我们根据企业名称、法人、电话、邮编信息,逐年对两个数据库作了匹配,最终得到2000~2013年共17681040条观测数据,覆盖245个国家和地区、9860种HS8位数产品和6098种HS6位数产品。

本文将企业-产品-国家的出口持续时间定义为一国的企业从开始向另一国市场出口某种商品直至出口中止所经历的时间。若企业在样本观测期内因某种原因停止对外国市场出口该商品,则将此定义为失败事件(failures)。关于生存数据,本文还做了如下处理:(1)左删截问题。本文是以2000~201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但在2000年前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多长并不知道,即存在左删截问题。解决方法是选择2001年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产品-目的国数据进行分析。(2)观测期内多个持续期问题。若企业-产品-目的国在观测期内有不止一次进入

退出出口市场的行为, 则会导致生存估计偏差。参考 Besedeš & Prusa (2006) 的做法, 本文将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每一次进入退出市场的行为视为相互独立的贸易持续时间段来进行分析。(3) 右删截问题。若在本文的研究期间, 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持续出口到观测期结束仍在进行贸易, 现有生存分析方法已经能对该问题有很好的解决。

(二) 中国制造业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出口生存的基本情况

如表 1 所示, 在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中, 有一段、两段、三段与四段出口持续时间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51.18%、22.93%、12.88%、7.25%, 而超过四段的企业占比只有 5.76%。

表 1: 企业贸易关系段统计

贸易关系个数	观测值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4390033	51.18	51.18
2	1966934	22.93	74.11
3	1104801	12.88	86.99
4	622172	7.25	94.24
5	319525	3.73	97.97
6	127098	1.48	99.45
7	37345	0.44	99.89
8	8232	0.10	99.98
9	1449	0.02	100.00
10	150	0.00	100.00
11	11	0.00	100.00
总计	857775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生成的出口生存数据得到(下同)。

本文将贸易关系分为所有贸易关系、第一段贸易关系和只有一段贸易关系的出口持续时间长度进行对比, 如表 2 所示。表 2 的第 1~2 列为所有贸易关系的出口持续时间分布, 可以看出, 75.40% 的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生存时间只有一年, 16.13% 的出口时间只有 2 年, 5.10% 的出口生存时间为 3 年, 而出口生存时间超过 3 年的样本仅有 3.37%。表 2 的第 3~4 列为第一段贸易关系的出口持续时间分布, 可以看出, 77.19% 的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1 年, 14.70% 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2 年, 4.73% 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3 年, 而出口生存时间超过 3 年的占比非常少, 为 3.38%。表 2 的第 5~6 列为只有一段贸易关系的出口持续时间分布, 可以看出, 80.90% 的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生存时间仅有 1 年, 13.55% 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2 年, 3.61% 的出口生存时间仅有 3 年, 而出口生存超过 3 年的只有 1.94%。这些数据都说明, 中国企业对特定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很短, 且大多贸易关系具有多个时间段, 这与国内外现有关于贸易持续时间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Besedeš & Prusa, 2006)。

表 2: 所有贸易关系、第一段贸易关系、只有一段贸易关系样本的出口持续时间长度

	所有贸易关系		第一段贸易关系		只有一段贸易关系	
	(1)	(2)	(3)	(4)	(5)	(6)
贸易时间长度(年)	观测值	百分比	观测值	百分比	观测值	百分比
1	6,467,552	75.40	4,622,610	77.19	3,551,551	80.90
2	1,383,528	16.13	880,315	14.70	594,842	13.55
3	437,628	5.10	283,408	4.73	158,674	3.61
4	158,291	1.85	104,641	1.75	48,759	1.11
5	67,897	0.79	50,595	0.84	20,161	0.46
6	34,747	0.41	25,804	0.43	8,882	0.20
7	15,844	0.18	11,967	0.20	4,191	0.10
8	6,465	0.08	5,114	0.09	1,631	0.04
9	2,892	0.03	2,252	0.04	712	0.02
10	1,705	0.02	1,298	0.02	387	0.01
11	644	0.01	490	0.01	142	0.00
12	356	0.00	289	0.00	76	0.00
13	201	0.00	156	0.00	25	0.00
总观测值/比重	8577750	100.00	5988939	100.00	4390033	100.00

(三) 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估计

生存分析方法通常采用生存率以及危险率来描述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特征。所谓的生存率也叫生存函数, 是指观测个体持续时间或生存时间超过特定时间 t (样本观测期) 的概率, 通常用于表示一些基于时间的系统失败或死亡概率, 记为 $S(t)$ ($0 \leq S(t) \leq 1$), 即

$$S_i(t) = Pr[t_i > t] = 1 - Pr[t_i \leq t] = 1 - F(t)$$

其中 t_i 表示特定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在某一国外市场上的生存时间。由 Kaplan - Meier 乘积限估计式给出的生存函数的非参数估计表示为:

$$\hat{S}(t) = \prod_{k=1}^t \frac{n_k - d_k}{n_k}$$

危险率或危险函数, 定义为一个个体在某一时点上死亡的风险, 也即一个个体恰好在某一时点上死亡 (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 的条件概率 (即风险), 记为 $h(t)$, 可写为:

$$h_i(t) = Pr(t - 1 < t_i \leq t | t_i > t - 1) = \frac{Pr(t - 1 < t_i \leq t)}{Pr(t_i > t - 1)}$$

由 Kaplan - Meier 乘积限估计式给出的风险函数的非参数估计表示为:

$$\hat{h}(t) = \frac{d_k}{n_k}$$

其中 n_k 表示 k 时期处于危险状态的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时间段的个数, d_k 表示同期观测到的失败对象的个数。

基于 Kaplan–Meier 乘积限估计式, 本文分别做了总体估计、分企业所有权估计、分产品类型估计与分国家政治距离估计。

1. 总体估计。

表 3 给出了所有贸易关系的第一个持续时间段、只有一个贸易持续时间段以及全样本的生存函数估计, 三者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显然, 全样本平均出口持续期最长, 而单个出口持续时间段的出口生存时间最短, 这一结论与陈勇兵等 (2012) 以及赵瑞丽等 (2016) 的研究结果一致。如图 1 为更直观的 Kaplan–Meier (KM) 生存函数的生存曲线图及危险率曲线图, 可以看出生存曲线呈下降趋势, 随着时间的增长, 逐渐趋于稳定。这表明在样本观测期间企业出口一开始面临着较高的风险率, 随着时间的增长, 之后迅速下降, 即贸易关系在企业出口初期面临失败的概率更高, 出口持续时间呈负时间依赖性。图 2 是不同贸易关系段的 KM 生存函数估计图, 可以发现无论是第一个贸易时间段、只有一个贸易时间段还是全样本, 均表明企业在最初 1~2 年的生存率相对较高, 随之下降, 并逐渐趋于稳定。

表 3: 中国企业出口函数的估计: 总体估计

	生存时间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均值	中位数			
第一个贸易时间段	1.467	1	8,228,745	5,736,083	5,988,939
只有一个贸易时间段	1.389	1	5,621,852	4,172,431	4,390,033
全样本	1.537	1	11,948,298	8,056,139	8,577,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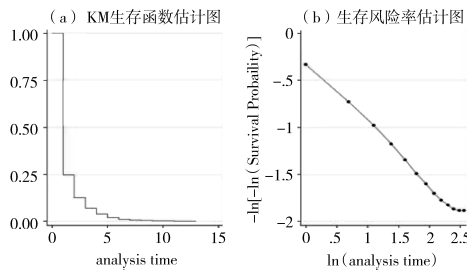


图1: 全样本出口企业生存函数与风险函数估计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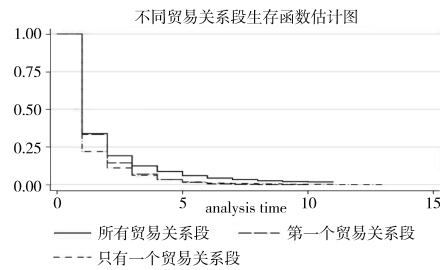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贸易关系的KM生存曲线估计

2. 按企业所有权估计。

表 4 体现的是不同所有权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 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发现, 外资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最长, 私营企业居中, 国有企业最短, 该结果和赵瑞丽等 (2016)、逯宇铎等 (2015) 以及陈勇兵等 (2012) 的研究结论一致。与国有企业相比, 由于私营企业没有太多的国家政策扶持, 同时没有外资企业的经营经验丰富, 其经营规模小、经营方式较为灵活、更注重经营效益与积累出口经验, 因而当双边政治关系恶化时, 它不如外资企业那般快速恢复在出口市场的经营, 但又比国有企业更积极去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因而私营企业的平均出口生存时间位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间。

表 4: 中国企业生存函数估计: 分企业所有权估计

	生存时间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均值	中位数			
国有企业	1.461	1	964,994	671,417	694,331
私营企业	1.496	1	4,441,519	3,141,008	3,385,544
外资企业	1.591	1	5,870,805	3,793,119	3,997,026

3. 不同产品类型估计。

本文根据 Rauch (1999) 将产品分为差异化产品、参考价格产品与同质产品来研究产品差异化程度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结果如表 5 所示, 差异化产品的平均生存时间最长, 参考价格产品与同质产品的平均生存时间几乎相等。这可能的原因是, 与参考价格产品以及同质产品相比, 差异化产品的差异程度高, 并且具有垄断定价能力, 因而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当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时, 由于其垄断定价与竞争优势的特性, 销售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利润更高, 因而这类企业会增加其利润留存和再投入, 抗风险能力更强, 平均出口生存时间更长。

表 5: 中国企业生存函数估计: 分产品类型估计

	生存时间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均值	中位数			
差异化产品	1.541	1	9,655,556	6,489,026	6,898,108
参考价格产品	1.493	1	1,056,411	727,867	768,898
同质产品	1.472	1	43,625	30,158	31,392

4. 按政治关系距离估计。

本文按照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的好坏对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作了估计。由于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首先对双边政治关系关于有可能导致国家建立和改善政治关系的因素进行回归^②, 得到残差。然后对残差值取平均值, 将伙伴国残差值小于等于平均值的国家设定为政治关系好的国家, 否则为政治关系差的国家, 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到, 两者的中位生存时间都是 1 年, 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 1.531 年和 1.527 年。也就是说, 国家之间的政治距离越近, 越有利于降低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因而出口持续时间越长。这可能和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行为有关, 联合国大会决议中, 其主要议题包括巴勒斯坦议题、殖民地问题、人权问题、发展问题等。Bailey et al. (2017) 对此测算了理想点距离, 在政治距离更近的国家中, 他们对这些议题的看法更为一致, 当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时, 这些国家会通过构建更高层面的信息交流平台和经贸洽谈会、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措施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 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表 6: 中国企业生存函数估计: 按国家政治距离估计

	生存时间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均值	中位数			
政治关系好的国家	1.531	1	3,700,737	5,448,431	3,957,327
政治关系差的国家	1.527	1	4,098,170	6,033,485	4,360,799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匹配生成的出口生存数据得到。

五、计量模型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是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离散时间的生存数据, 选取离散 Cloglog 模型估计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 同时使用 Cox 模型、Logit 模型和 Probit 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离散 Cloglog 模型可表示为:

$$\text{cloglog}(1 - h(t, X_{fkd,t})) = \beta \text{relation}_{dt} + \eta X_{fkd,t} + \gamma_t + \mu_{fkd,t} \quad (1)$$

其中, f 、 k 、 d 、 t 分别表示企业、产品、出口目的国和年份。 relation_{dt} 代表的是国家 d 第 t 年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 是核心解释变量。由于建交时间对双边政治关系存在影响, 本文借鉴许政等 (2010), 在双边政治关系指标中剔除了建交时间、建交时间与时间的交叉项, 最后用得到的结果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β 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估计系数。 $X_{fkd,t}$ 为控制变量的合集, η 为对应的估计系数向量, $h(t, X_{fkd,t})$ 为给定控制变量、企业在第 t 年的风险概率。 γ_t 表示基准风险率, 即当所有解释变量的值都接近于零时企业在出口贸易市场所面临的风险, $\gamma_t = \log(H_t - H_{t-1})$ 代表在 $[t-1, t]$ 区间内的基准风险率差异, 它表达了基准风险率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mu_{fkd,t}$ 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与衡量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0”或者“1”的虚拟变量, 它代表贸易关系在第 t 年结束与否, 其中, 若在样本观测期期间贸易关系结束, 则在当期定义为 $fail$ (“失败”事件), 且赋值为 0; 若在样本观测期期间一组贸易关系是完整的, 则将其最后一年的 $fail$ 赋值为 1。

2.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改变已有大多数研究使用双边伙伴关系、冲突、负面评分或大国关系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 (杨攻研、刘洪钟, 2015) 的做法, 本文参考 Bailey et al. (2017) 与刘敏等 (2020) 利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测算的国家间政治倾向理想点距离来测度双边政治关系, 以避免由事件分析法引起主观评价所带来的认知偏差问题。联合国大会提供了 2003~2013 的 11 届大会中的 789 次决议, 其中议题涉及核武器和核材料问题、武器控制和裁军问题、殖民地议题、人权问题、发展问题等。Bailey et al. (2017) 测算出各国之间在政治立场上的理想点, 其中以各国在理想点上的差值来表示两国之间的国

际政治倾向距离。通过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上的投票行为, 可以了解在国际重大事件或国际大形势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看法有多大程度的区别, 进而可以衡量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 其中数值越小代表双边政治关系越近, 数值越大代表双边政治关系越远。

3. 控制变量。

首先, 本文需要控制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因素。参考目前多数研究双边政治关系的文献, 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1) 东道国 GDP。孙忆、孙宇辰 (2017) 认为国家间实力的差距会影响两国建立亲密关系, 因此本文用东道国每年 GDP 的对数来衡量一国的实力并加以控制。(2)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对数。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FDI) 可以反映一国经济状况, 一国能吸引越多的外商投资, 说明该国具有市场价值。(3) 简单平均关税, 关税有可能会影响双边政治关系。例如,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 2018 年 3 月宣布, 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 而加征关税会对中美政治关系产生影响。(4) 东道国城镇人口占比, 用来反映一国城市化进程,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各国进行对外投资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 而由于经济利润逐渐贯穿政治, 因此有可能影响双边政治关系。(5) 贸易依存度。用东道国服务和货物出口占 GDP 比值衡量, 孙忆、孙宇辰 (2017) 指出贸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意味着双方处于互惠互损关系下, 尽管两国已经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的政治关系。

其次, 本文需要控制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因素。参考目前多数文献的做法, 本文控制了企业出口产品数量、企业出口目的国总数、企业出口额对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陈勇兵等, 2012)、用企业资产总计对数和企业员工总数对数来衡量的企业规模 (Esteve-estévez et al., 2013)、是否为国有企业 (许和连等, 2019)、是否为外资企业、中国与目的国是否相邻、中国与目的国距离 (谭智等, 2014; 许和连等, 2019)。

除此以外, 由于国家固定效应和其他变量存在高度共线性, 从而出现无限迭代问题, 因此本文不予以控制。本文控制了 GB/T2 位数行业、企业所有权类型、企业贸易方式、是否为 OECD 国家、年份的固定效应。

六、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7 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 第 (1) 列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 双边政治关系的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第 (2) 列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加入 GB/T2 位数行业、企业所有权类型、企业贸易方式、是否为 OECD 国家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第 (3) 列在第 (2)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由于双边政治关系值越大代表双边政治关系距离越远, 意味着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从而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即假说 1 成立。

表 7: 基准估计结果

	(1)	(2)	(3)
	fail	fail	fail
双边政治关系	0.9697 *** (243.2226)	0.0568 *** (6.8677)	0.0422 *** (3.550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0.0838 *** (25.4520)
企业员工人数对数			0.0282 *** (8.2768)
企业资产总计对数			0.0094 *** (13.1318)
企业出口产品总数对数			-0.0312 *** (-34.3232)
企业出口国家总数对数			-0.1851 *** (-212.1358)
简单平均关税			0.0020 *** (21.0948)
企业出口额对数			0.0041 *** (6.8922)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对数			-0.0047 *** (-7.1027)
GDP 对数			-0.0871 *** (-101.0146)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0.0003 *** (-5.4125)
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比重			-0.0002 *** (-6.5618)
是否为国有企业			0.0698 *** (14.7622)
是否为外资企业			-0.0582 *** (-28.8240)
两国间首都距离对数			0.0750 *** (39.6213)
两国是否相邻			0.0705 *** (17.9087)
常数	-0.3076 *** (-55.9092)	2.2682 *** (40.0261)	4.2165 *** (63.3778)
GB/T2 位数行业	否	是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否	是	是
企业贸易方式	否	是	是
是否为 OECD 国家	否	是	是
年份	否	是	是
N	8384049	8354081	7001042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参数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表 8 分别基于 Probit、Logit 和 Cloglog 模型对第一段贸易关系的样本和只有一段贸易关系样本进行随机效应估计。双边政治关系系数的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均几乎在 1% 水平下正向显著。也就是说,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显著降低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因此, 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使用不同测度双边政治关系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9。第 (1) 列使用当年是否建立伙伴关系来衡量双边政治关系, 其为二元虚拟变量, 取值

表 8: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第一段贸易关系			只有一段贸易关系		
	Cloglog	Probit	Logit	Cloglog	Probit	Logit
双边政治关系	0.0431 *** (3.42)	0.0445 *** (2.78)	0.0598 ** (1.99)	0.0466 *** (3.4854)	0.0465 *** (2.7253)	0.0657 ** (2.04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4.191 *** (61.89)	5.952 *** (66.76)	12.06 *** (66.63)	4.1648 *** (60.3258)	5.9193 *** (65.0788)	11.9648 *** (64.9542)
GB/T2 位数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贸易方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为 OECD 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089872	6089534	6089534	5297170	5297170	5297170

表 9: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1)	(2)	(3)
	fail	fail	fail
当年是否建立伙伴关系	-0.0548 *** (-22.7228)		
友好城市数量		-0.0049 *** (-3.2894)	
领导人访问			-0.0103 *** (-4.23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	4.1725 *** (64.5758)	4.2549 *** (30.1126)	1.0263 *** (7.2008)
GB/T2 位数行业	是	是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是	是	是
企业贸易方式	是	是	是
是否为 OECD 国家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N	7120229	1491020	966525

为 0 代表当年没有建立伙伴关系, 取值为 1 则代表当年建立伙伴关系, 该数据库引用了 Sun & Liu (2019) 的“中国外交伙伴关系数据库”, 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与 72 个国家建立了 101 对共 16 种类型的伙伴关系^③。第 (2) 列使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代理核心解释变量 (杨连星等, 2019), 中国“一带一路”统计年鉴统计了 1973~2018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第 (3) 列根据我国外交部官网统计的 2003~2014 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出访次数作为衡量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 (杨连星等, 2019)。三种不同的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 内生性问题及解决

尽管本文控制了多个变量, 但还是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即可能存在同时影响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遗漏变量,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第 (1) 列, 参考孙俊成、程凯 (2020) 以双边政治关系一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第 (2) 列, 参考孙俊成、程凯 (2020) 采用双边政治关系二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第 (3) 列, 借鉴 Lewbel (2012) 提出的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的识别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上述三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即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成立。

表 10: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估计结果

	(1)	(2)	(3)
	fail	fail	fail
一期滞后项	0.0501 *** (4.0880)		
二期滞后项		0.0498 *** (4.0583)	
双边政治关系			0.0784 *** (40.85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	2.3922 *** (36.4238)	2.4005 *** (36.5286)	0.8275 *** (308.3121)
所有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N	6820201	6619244	7026231

(四) 异质性分析

1. 区分出口产品特征。

本文根据 Rauch (1999) 将产品分为差异化产品、参考价格产品以及同质产品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11 第 (1) 列所示。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差异

化产品的促进作用最显著, 其次是参考价格产品, 对同质产品的作用不显著。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高, 其进入国际市场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获取的利润更高。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差异化程度更高的企业 - 产品竞争力提升, 扩大利润留存和再投入, 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因而这类企业 - 产品的生存时间更长。张慧敏、刘洪钟 (2020) 也认为差异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对政治距离越敏感。

2. 区分贸易方式。

按不同贸易方式将企业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 回归结果如表 11 第 (2) 列所示。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对一般贸易企业的作用更大。一般贸易企业自主进行生产、寻找销售对象、开拓市场、构建营销渠道、规避各种贸易壁垒, 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成本更高。因此改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贸易成本和面临的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一般贸易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3. 区分企业所有权。

本文认为由于政府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参与程度不同, 因而不同企业所有权性质有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检验双边政治关系对不同所有权企业 (将企业分类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的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结果见表 11 第 (3) 列。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并对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对外资企业虽为抑制作用但不显著。

4. 区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本文将目的国划分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11 第 (4) 列所示,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的原因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水平更落后, 政治环境更不稳定, 国内的社会治理水平相对更差, 各种潜在的贸易壁垒可能更高, 因此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能带来更大的促进效应。

5. 区分国家政治风险。

由于企业进入一国市场可能会面临政府失能、政权变更、腐败、政策变化无常等带来的风险。因此, 本文采用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 (ICRG) 将国家分为高政治风险和低政治风险。该数据包含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和官僚机构质量等 12 个指标, 各指标分值加总得到各国的政治风险水平, 取值越大代表政治风险越低, 然后按照均值将国家分为高政治风险和低政治风险, 回归结果如表 11 第 (5) 列所示。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高政治风险国家的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降低更为明显。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可能有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国际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成本越高, 因此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所带来的作用越大。

表 11: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fail	fail	fail	fail	fail
差异化产品 * 双边政治关系	0.0453 *** (3.6827)				
参考价格产品 * 双边政治关系	0.0267 ** (2.1331)				
同质品 * 双边政治关系	-0.0021 (-0.1263)				
一般贸易 * 双边政治关系		0.0640 *** (4.6676)			
加工贸易 * 双边政治关系		0.0396 ** (2.1628)			
国有企业 * 双边政治关系			0.2208 *** (7.6318)		
私营企业 * 双边政治关系			0.0620 *** (4.5089)		
外资企业 * 双边政治关系			-0.0207 (-1.4143)		
“一带一路”国家 * 双边政治关系				0.0741 *** (6.1748)	
非“一带一路”国家 * 双边政治关系				0.0253 ** (2.1212)	
高政治风险国 * 双边政治关系					0.0529 *** (4.4353)
低政治风险国 * 双边政治关系					0.0318 *** (2.66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4.1889 *** (61.9522)	4.1726 *** (56.6786)	3.9733 *** (52.6710)	4.5006 *** (67.0325)	4.2294 *** (63.5689)
所有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6700680	5929484	7001042	7001042	7001042

七、机制分析

有效降低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是贸易关系持续发展的十分重要因素。Böhmelt (2010) 和 Pollins (1989) 认为，良好的政治关系能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陈勇兵等 (2012) 指出，贸易成本的变动会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持续时间。因此本文认为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2004) 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text{cloglog}(1 - h(t, X_{fjdt})) = \beta \text{relation}_{dt} + \eta X_{fjdt} + \gamma_t + \mu_{fjdt} \quad (1)$$

$$Mechanism_{dt} = \beta_1 relation_{dt} + \eta_1 X_{dt} + \gamma_t + \mu_{dt} \quad (2)$$

$$cloglog(1 - h(t, X_{fkd})) = \beta_2 relation_{dt} + \beta_3 Mechanism_{dt} + \eta_2 X_{fkd} + \gamma_t + \mu_{fkd} \quad (3)$$

其中 $Mechanism_{dt}$ 为渠道变量, 它代表目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 采用亚太经社会与世界银行联合构建的贸易成本数据库 (ESCAP - World Bank Trade Cost Database) 中的“双边贸易成本”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 200 个国家在 1995~2017 年间基于整体、农林渔牧部门以及制造业部门三个层面的双边贸易成本。全球贸易成本数据库是依据 Jacks et al. (2011) 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的测度方法构建而成。回归结果如表 12 所示, β 、 β_1 、 β_2 和 β_3 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即假说 2 成立。

表 12: 机制分析

	(1)	(2)	(3)
	fail	双边贸易成本	fail
双边政治关系	0.0422 *** (3.5502)	0.3591 *** (4.5602)	0.0737 *** (6.0544)
双边贸易成本			0.1868 *** (43.86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	4.2165 *** (63.3778)	7.9322 *** (33.0227)	2.8435 *** (38.1962)
GB/T2 位数行业	是	否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是	否	是
企业贸易方式	是	否	是
是否为 OECD 国家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N	7001042	1322	6850467

八、结论

本文基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使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的影 响。研究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出口风险, 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使用不同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且这种影响存在产品类型、企业所有权、贸易方式、目的国异质性。具体而言, 该影响对出口差异化产品的作用最大, 其次是参考价格产品, 对同质产品的作用不显著; 对一般贸易企业的作用大于加工贸易企业; 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最大, 其次是私营企业, 对外资企业的作用不显著; 对“一带一路”共建国的作用大于非“一带一路”共建国; 对高政治风险国家的作用大于低政治风险国家。最后,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够通过降低双边贸易

成本进而延长企业 - HS8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

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第一, 本文论证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可能性, 评估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实际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意味着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 不仅对于创造良好和谐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 也能成为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因此, 中国应继续坚持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积极与他国在保持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 从而降低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成本, 增强中国企业在不确定性的出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此外, 中国还应继续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多边组织与世界各国充分接触, 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支撑开放经济新体制, 形成以合作共赢为共同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二, 创造良好的双边政治环境, 积极利用外交为企业出口经营保驾护航。本文的结果意味着, 外交布局不仅与我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也与企业国际经营的成本和风险密切相关。因此, 政府可以利用外交来创造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政治风险高、政策变化激烈的国家的良好双边政治环境, 从而降低企业出口经营的成本和风险。当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遇目的国的政策壁垒、政策刁难或者政策朝令夕改的冲击时, 政府可以通过外交与目的国政府斡旋, 尽可能降低企业出口贸易的成本和政策风险。同时, 要特别重视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贸易方式的差异, 重视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更可能面临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 从而在对外交往时能采取措施缓解外交关系变动对国有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造成的冲击。

第三, 积极稳妥塑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国际发展理念话语权。2014 年“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 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还应坚持能提高世界各国利益契合度的理念与倡议, 现有“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以及“世界梦”理念受到了国际社会认同, 要实现提升我国国际发展话语权, 中国应坚持“合作共赢”, 让世界享受中国的发展“红利”, 强调中国各类倡议和行动方案的开放性和互惠性, 从而为中国企业同其他国家企业的发展创造稳定和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第四, 强化中国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方面, 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 中国企业进行出口贸易面临着不确定性风险。因此, 进行对外贸易的企业应注意加强自身风险防范意识, 积极收集与研判国际市场相关动态信息的变化, 时刻做好风险分析与风险预警。另一方面, 企业应熟悉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预判企业在出口中可能遇到的因政治关系带来的出口成本和风险, 在出口贸易中积极跟随国家外交布局和坚持国家的外交原则, 利用国家外交关系发展带来的政策红利, 降低出口风险和成本, 提高在出口中的生存能力。

(通讯作者 陈瑾电子邮箱: chenjingdufs@163.com)

注释:

- ① 邵军(2011)指出中国的中位与均值贸易持续时间仅分别为2年和2.84年,陈勇兵等(2012)同时指出,中国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与均值分别为3年和2年,均表明中国的出口持续时间较为短暂。这种在国际市场上短生存期的企业贸易行为,无疑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不利于出口平稳增长。
- ② 其中有可能导致国家建立和改善政治关系的因素包括人口、GDP、劳动总人数、劳动参与率、制度质量、城镇人口占比、汇率、国家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等,其中制度质量采用全球治理指标来衡量,包括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性等6个维度。
- ③ 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未详细介绍该数据库,具体可参见 Sun & Liu(2019)。

参考文献:

- 陈勇兵,李燕,2012. 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进展[J]. 国际贸易问题(10):28-42.
- 陈勇兵,李燕,周世民,2012. 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J]. 经济研究(7):48-61.
- 邓路,2018. 国家形象、交易信任与出口持续时间——来自中国产品层面的证据[J]. 当代财经(10):14-23.
- 杜运苏,杨玲,2013. 中国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分析:1995-2010[J]. 国际贸易问题(11):14-23.
- 李星辰,刘宏曼,2020. 双边关系与出口持续时间——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3):37-48.
- 刘洪铎,陈晓珊,2018.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联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3):29-45.
- 刘慧,綦建红,2017. 以往经验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4):3-13.
- 刘敏,朱亚鹏,辜良烈,2020.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J]. 南方经济(7):18-38.
- 逮宇铎,陈金平,陈阵,2015. 中国企业进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5):42-51.
- 罗胜强,鲍晓华,2018. 反倾销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4):135-145.
- 马佳羽,韩兆洲,2018.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持续期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统计研究(6):31-42.
- 邵军,2011. 中国出口贸易联系持续期及影响因素分析——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的新视角[J]. 管理世界(6):24-33.
- 沈立君,侯文涛,2017. 反倾销壁垒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数据的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5):95-112.
- 孙俊成,程凯,2020. 双边政治关系、产品质量与出口行为[J]. 世界经济研究(7):90-104.
- 孙忆,孙宇辰,2017. 自由贸易协定能提升国家间亲密度吗?——基于中国周边 FTA 的实证分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4):129-154.
- 谭智,王翠竹,李冬阳,2014. 目的国制度质量与企业出口生存:来自中国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8):87-101.
- 王珏,李昂,周茂,2019. 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J]. 当代财经(1):96-107.
- 王智新,黄瑞玲,2020. 国家间政治关系、制度差异与企业国际化模式[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6):89-115.
- 魏昉,程文先,2021. 地区出口制度复杂度会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6):70-85.
- 魏自儒,李子奈,2013. 进入顺序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J]. 财经研究(8):51-63.
-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2004.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5):614-620.
- 谢建国,2006. 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12):8-17.
- 许和连,李娟,王海成,2019.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研究[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3):48-61.

- 许政,陈钊,陆铭,2010. 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J]. 世界经济(7):144-160.
- 杨攻研,刘洪钟,2015. 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J]. 世界经济与政治(12):110-130.
- 杨连星,刘晓光,罗来军,2016. 出口价格、出口品质与贸易联系持续期[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8):80-96.
- 张慧敏,刘洪钟,2020. 政治距离、文化差异与中国的对外贸易[J]. 国际经贸探索(1):33-52.
- 张建红,姜建刚,2012.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12):133-155.
- 赵瑞丽,孙楚仁,陈勇兵,2016. 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J]. 世界经济(7):97-120.
- Anderson J E, Van Wincoop E,2004. Trade cost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42(3):691-751.
- Athanassiou E, Kollias C,2002. Modeling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tension on foreign trade:Some preliminary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Greek-Turkish rivalry[J].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13(5):417-427.
- Bailey M A, Strezhnev A, Voeten E,2017.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61(2):430-456.
- Besedeš T, Prusa T J,2006. Ins, outs, and the duration of trade[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39(1):266-295.
- Böhme T,2010.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54(4):566-592.
- Disdier A C, Mayer T,2007. Je t'aime, moi non plus: Bilateral opin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3(4):1140-1159.
- Esteve-Pérez S, Requena-Silvente F, Pallardó-Lopez V J,2013. The duration of firm-destination export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Spain, 1997-2006[J]. *Economic Inquiry*,51(1):159-180.
- Fugazza M, McLaren A,2014. Market access, export performance and survival: Evidence from Peruvian firm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2(3):599-624.
- Fugazza M, Molina A C,2016. On the determinants of exports survival[J].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37(2):159-177.
- Hess W, Persson M,2011. Exploring the duration of EU imports[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147(4):665-692.
- Jacks D S, Meissner C M, Novy D,2011. Trade booms, trade busts, and trade cos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3(2):185-201.
- Jönsson C,2002. Diplomacy, bargaining and negotiation[M].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Keohane N O,2005. On leadership[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3(4):705-722.
- Keshk O M G, Pollins B M, Reuveny R,2004. Trade still follows the flag: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a simultaneous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and armed conflict[J]. *Journal of Politics*,66(4):1155-1179.
- Lewbel A,2012. Using heteroscedasticity to identify and estimate mismeasured and endogenous regressor models[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30(1):67-80.
- Li Q, Vashchilko T,2010. Dyadic military conflict, security alliances, and bilateral FDI flow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41(5):765-782.
- Long A G, Leeds B A,2006. Trading for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43(4):433-451.
- Martin P, Mayer T, Thoenig M,2008. Make trade not war?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3):865-900.
- Mitchener K J, Weidenmier M,2008. Trade and empire[J]. *Economic Journal*,118(533):1805-1834.
- Pandya S S, Venkatesan R,2016. French roast: Consumer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Evidence from supermarket scanner dat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98(1):42-56.
- Pollins B M,1989. 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3(2):465-480.
- Rauch J E,1999. Networks versus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8(1):7-35.
- Sun C, Liu Y,2019. Can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tic strategy benefit for or promote its outward foreign director investment? [J]. *China and World Economy*,5:108-134.

**Does the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Prolong the Export
Products Du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SUN Chu -ren, LI Mei -mei, CHEN Jin

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China 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 database and the voting data of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om 2000 to 2013, this paper applies the survival analysi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on the export du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HS8-digit products -destination count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helps to reduce the export risks of the enterprises and prolong the export du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2)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can prolong the export products du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by reducing the cost of bilateral trade; (3)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on the export products du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varies depending on product type, enterprise ownership, enterprise trade pattern, whether the countries ar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level of political risk in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the improvement of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evaluates its actual impact on the export du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HS8-digit products -destination countries, which can provide some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China's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export dur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survival analysis; trade cost

(责任编辑 春 晓)